

中华文化是诗意人生的乐土

在中华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就是以人为本。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正是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使他对生命感到充实、自信,从而在对真与善的追求中实现了审美的愉悦感,并升华进入诗的境界,这就是为后儒叹慕不已的“孔颜乐处”。庄子以浪漫的态度对待人生,他希冀着超越现实环境的绝对自由,但在追求人生的精神境界而鄙薄物质享受这一点上则与儒家殊途同归。正是在这种潇洒、浪漫的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庄子才能在自由的精神世界中展翅翱翔。

儒、道两家相反相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学者或称之为艺术的或审美的人生观,我觉得不如称之为诗意的人生观更为确切。因为那种执着而又潇洒的生活态度,那种基于自身道德完善的愉悦感,那种对朴素单纯之美的领悟,那种融真善美为一体的价值追求,除了“诗”这个词以外简直无以名之。

正因如此,“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成为中华先民对诗歌本质的共同认识。中国诗歌的创作主体是人,它所表现的客体也是人,它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中华先民的诗歌创作是全民族陶写心声的普遍方式,中华大地也就成了一个诗的国度。

在古代中国,诗人成为全社会所仰慕的崇高称呼。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无数的志士仁人,这些志士仁人往往本身就是杰出的诗人,他们用优美的诗句表达了内心对人生道德境界的追

求。行吟泽畔的三闾大夫和漂泊江湖的少陵野老已经凭借其壮丽诗篇在中国人民心中获得了永生,文天祥舍生取义的人格精神已凝聚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诗中。到了近代,谭嗣同在狱中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句诗宣示以身殉国的精神,留学异国的鲁迅用“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来表达对祖国的满腔热爱。

屈原是诗国中绝无仅有的一位烈士,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大诗人,他的作品与《诗经》并称,被誉为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他高尚伟岸的人格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永久的典范。他以高洁的政治品格傲视着群小,他以高远的人生追求拒绝了尘俗。

陶渊明是诗国中最著名的隐士,他生逢晋宋易代的乱世,一生平淡无奇,做过几任小官后便辞职回乡,隐居终老。他的作品内容朴实,风格平淡,并不以奇情壮采见长,当时几乎没有受到文坛的注意。但是陶渊明身后的声名却与日俱增,最终成为受到后代士人无比敬仰的文化伟人。原因在于,陶渊明在历史上树立了一个安贫乐道、廉退高洁的典型,其意义在于,他用实际行动阐释了平凡人生的意义,证明了与功业建树毫无关系的平淡人生也可以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也证明了朴素乃至贫寒的平凡生活也可以具有浓郁的诗意的。

李白是诗国中独往独来的一位豪士。他天性真率,狂放不羁,充分体现了浪漫乐观、豪迈积极的盛唐精神。他决不盲从任何权威,一生追求自由思想和独立的意志。李白的诗歌热



情洋溢,风格豪放,像滔滔黄河般倾泻奔流,创造了超凡脱俗的神奇境界,包蕴着上天入地的探索精神。李白的意义在于,他用行为与诗歌维护了自身的人格尊严,弘扬了昂扬奋发的人生精神。多读李白,可以鼓舞我们的人生意志,可以使我们在人生境界上追求崇高而拒绝庸俗,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解放而拒绝作茧自缚。

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典型的儒士。他服膺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以关爱天下苍生为己任。杜甫生逢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关头,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动荡时代,时代的疾风骤雨在他心中引起了情感的巨大波澜,他用诗笔描绘了兵荒马乱的时代画卷,也倾诉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沉郁情怀。杜甫因超凡入圣的人格境界和登峰造极的诗歌成就而被誉为中国诗歌史上唯一的“诗圣”。杜甫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穷愁潦倒的一介布衣,平生毫无功业建树,却实至名归地跻身于中华文化史上的圣贤之列,从而实现了人生境界上跨度最大的超越。杜甫是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命题的真正实行者,他永远是后人提升人格境界的精神导师。

苏轼是诗歌史上最名实相符的居士。一方面,他深受儒家淑世精神的影响,在朝为官时风节凛然,在地方官任上则政绩卓

著。另一方面,他从道家和禅宗吸取了离世独立的自由精神,形成了潇洒从容的生活态度。苏轼一生屡经磨难,曾三度流放,直至荒远的海南,但他以坚韧而又旷达的人生态度傲视艰难处境,真正实现了对苦难现实的精神超越。苏轼热爱人世,他以宽广的胸怀去拥抱生活,以兼收并蓄的审美情趣去体味人生,他的诗词内容丰富,兴味盎然,堪称在风雨人生中实现诗意生存的指南。

辛弃疾是诗国中少见的雄

豪英武的侠士。他本是智勇双全的良将,南渡后曾向朝廷提出全面的抗金方略,雄才大略盖世无双。可最终报国无门,赍志而殁。辛弃疾的词作充满着捐躯报国的壮烈情怀,洋溢着气吞骄虏的英风豪气。他以军旅词人的身份把英武之气掺入诗词雅境,遂在词坛上开创了雄壮豪放的流派。多读辛词,可以熏陶爱国情操,也可以培养尚武精神。那种为了正义事业而奋不顾身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导致人生境界的超越。

读诗,阅读上述六位诗人的好诗,一定会使我们从浑浑噩噩的昏沉心境中蓦然醒悟,一定会使我们从紫陌红尘的庸俗环境中猛然挣脱,从而朝着诗意生存的方向大步迈进。为什么要追求诗意的生存?因为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生的真谛。

(莫砺锋)

本周荐书



《溪畔灯微：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
刘志伟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只有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才会体会到真正的中国的样子。所有的理论都来自于实践。不论是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还是费孝通的社会人类学调查,都是要走下去,走到中国的基层社会中,那里才能看到中国社会的脉络、机理和生发的理论。中国何以为“中国”。本书是作者在读书时所思所想的话题,集中在社会经济史研究、地方文献的价值、区域的实践、“齐民社会”与传统乡村,回顾了四十年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传统、路径及转向,社会经济史研究与区域研究的结合。

连载

清末新政与华德中兴煤矿公司 (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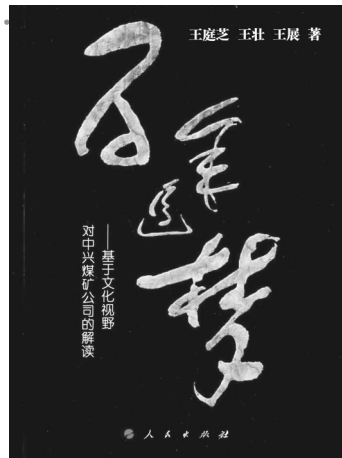
外国人愿意借给钱。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不把中国的主权当回事儿,随意加大铁路造价者有之,随意破坏合同、延长工期者有之,随意将所得权益转让他国或他人者亦有之。南起广州、北接卢汉铁路的粤汉铁路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引起了粤、湘、鄂三省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对国家命运的进一步担忧,收回路权、废约自办铁路的运动从粤汉铁路发端。在这种局面下,1903年,新成立的商部出台《铁路简明章程》,鼓励各省士绅、华商成立铁路公司,筹款自办铁路。以收回路权为宗旨的商办铁路热潮盛极一时。1905年,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结束。中国国民将俄国的失败归结于君主专制制度,而把日本的胜利归结于君主立宪制度,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思潮空前高涨。清政

府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表示准备实行民主立宪政治。在铁路方面,清政府目睹了日俄战争期间俄国是如何利用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调集军队的,因而对于外国资本控制中国铁路产生了极大的恐惧。1905年9月,清政府借助民间舆论的力量与美方谈判,以巨大的代价废除了中美粤汉铁路合同;并与英方谈判,准备废除中英沪杭甬铁路草约。清政府的行动,促使立宪运动和民间收回路权主权的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可是,清政府很快又害怕了,害怕民主立宪政治会损害满族贵族的权力;害怕铁路商办后不能统一节制,同样会损害中央集权。于是,一方面借官制改革,把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向满族亲贵手中集中;另一方面成立邮传部,统一管理各省铁路,并准备将各省的商办铁路

收归国有。由于收回路权主权运动沉重打击了列强的嚣张气焰,并使列强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所以,列强这时候也愿意以稍微优惠一点儿的条件向清政府放款。清政府就变脸了,又开始借外国贷款修中国铁路,实行铁路国有。

邮传部作为清末新政大部,它的意见直接影响到清廷的政策。陈璧担任邮传部尚书是在1907年4月。在他之前,新成立不久的邮传部已先后有过四任尚书。毫无疑问,邮传部尚书的理念与清廷的铁路政策密不可分。在陈璧之前,邮传部还是支持商办铁路的。陈璧一改前弦,鼓动清廷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陈璧首先拿办得最有成效的沪杭甬铁路开刀,将已经接近完工的沪杭甬铁路交给英国人去办,并以大折扣、高利息向英国借款,这就令人

不可思议了。陈璧在干什么?显然是借铁路国有之名,行出卖国人利益之实。陈璧的所作所为,激起极大民愤。江、浙两省绅民自发组织起来拒款护路。拒款会遍及两省各地,上至绅士、商人,下至学生、码头工人,乃至乞丐、妓女也纷纷加入护路团体。续招路款的热潮顿时兴起。很短时间,两省绅民就集得4280万元,比邮传部的借款数额超出一倍多。《申报》为此评论:“向日旧约作废,经政府之宣告,英人之承允,凡我父老子弟知土地因是可以保全,财产可因是永守,故不屑掷其数千百万之巨资,绞脑沥血而成之。今乃英人之要求,政府之一退谄,遂双手供献而让之。我苏浙两省之父老子弟,即不为目前计,而不为子孙计乎!国可灭,民心不可灭,我父老子弟其磨砺以待。”



一条已接近完工的商民自办铁路,邮传部一声令下,不分青红皂白地收归国有不说,还与英商签订了不公正的合同。这不单是欺民,更是公然卖国!邮传部为什么敢这样做?原来是清廷反悔了。

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朝统治者总结战争失败的原因,认为没有铁路运兵缓慢是重要原因之一。于是,兴修铁路遂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兴办铁路需要大笔款项,甲午战败后割地、赔款,国家拿不出钱,而